



TITLE: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一般讨论

AUTHOR(S):

CITATION: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一般讨论. 2015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 東アジア若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6: 206-211

ISSUE DATE:

2016-06-04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215767>

RIGHT:

一般讨论

编辑和翻译：中山大将、姜海日、杨维公、巫靓

提问与感想

坂梨健太：

第一,我認為“國家”、“民族”、“地域”、“人類”這些概念一旦絕對化了都具有危險性。

第二,我覺得中山先生所言“市民”的概念在日本社會也是少數派,日本社會正逐漸喪失能夠使普通民衆成為“市民”的餘力。

野口優：

我想簡單說一下自己的感想，是有關“與市民社會關係”的。三位討論者出現了一個共同之處，即都只是從“研究者”的觀點進行討論。然而，在將來我們都很有可能成為的大學教員或研究機關研究員，從而擁有“教育者”的一面。目前三位都是“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員”，當三位在將來擔任“教育”工作時，對這些議題的意見又會有何變化,我很感興趣。

丁 韋尼阿明：

對於中山先生所說的國家之間“不一定需要徹底共有歷史認識”意見，我完全贊同。我也認為國家之間歷史認識並非一致，然而我擔憂持有“既然歷史認識不需一致的話，那也沒有交流的必要”的想法的人會增多。我認為重要的是，應該逐步過渡到思考為何自己國家的歷史認識跟他國不一致的階段。

杨维公：

我非常赞同四位提到的有关缩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见。这里想就我自身被问到过的问题向各位请教。以国立大学为对象的文科缩小与学生人数的减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国立大学的学生如果减少了，那么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会相应地有所增加。对于连人都招不满的私立大学来说这看上去是一个有利的情况。反过来想，如果私立大学倒闭了，那么研究的岗位就会减少，也会出现国立大学毕业的研究者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矢内真理子：

對於“學問之自由”與“研究之自由”，我認為這些是不存在國境的。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研究者是在耗費相當多時間以及站在前人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才能成立的，無法像當今社會所想，立刻就能得出成果，研究價值都能轉換為金錢。

日本的大媒站在國家的立場進行報導(如我以前有關“釣魚台國有化的日本報紙報導”的研究。)。我同意福谷同學所說的我們研究者不應該由被大媒體利用的想法。

江俊億：

福谷同學提到「研究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不同,我認為是非常切中現實的觀察.不知道您或其他與談人對最現實的媒體如何與研究者自身「不切實際」的態度結合,有無什麼展進一步的理想呢?誠心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感激!

瀨戶徐映里奈：

對於肩負應當可能性責任的同時,關注“人類”,我大體能夠同意。雖然對於研究者來說,能夠自由研究當然很重要,今天討論的話題主要是關於研究者應該如何對研究對象或研究中所描述的人負責的問題。我覺得研究者應該如岩下教授那樣,對既定的觀點提出不一樣的看法,這才是學術的貢獻。

然而,關於中山先生在文中所列舉的朴裕河被提起公訴之事,您在文中忽視了她是被受害的 할머니(韓文中指奶奶)們告發的事實。有關小倉紀藏教授指出的所謂“正確的歷史形象”排除其他歷史形象,然而,換到小倉教授的想法,最終祇會是國家當中受害者的“人”被擠壓,矮小化。對於如何面對研究對象這個問題,請您給出回答。

林子博：

王同学在发言中提到中国政府将“过量的历史”推到政治的舞台,对此我有一些比较原理性的提问。即究竟多少的量或者说什么样程度的历史才能称之为“适宜”?换言之,对于判断其“过量不过量”的标准您究竟是怎样认为的?比如,陈威璠学长的发言中提及的中国抗日剧的激增等等,基于目前中国社会现状以及政治动向,您能论述一下您的想法吗?

回应**陳威璠：**

以下我將針對八位,包括對我進行的所有提問進行回答。首先是坂梨老師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國家、民族、地域、人這所有的視角是不是都祇是比較狹窄的角度的問題。其實我想這是因為所有的視角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想不同的視角,它自然而然就會有不同的限制。每個視角都有他狹窄的一面,會使它看不到一些東西。但是因為我們不是上帝,我們祇能使用狹窄的視角。我們祇要知道如何因為某些限制而使我們換成另外一種視角,我想這樣就可以了。可能是很天真的答案,但這是我現在目前為止的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市民在日本是比較少數人的這一問題,其實我想在臺灣,也同樣有這個問題。在臺灣有一些教授,他們會組織簡單的活動,針對一般的民眾,這是為了培養大家討論的習慣,讓人們從一般的民眾變成公民。當然光依靠這樣的努力是不夠的。因為一般的民眾要變成市民,有時候需要一些特別的事件。臺灣是徵兵制的國家,所以有時候會發生人們在當兵的時候死去的事件。在2013年,因為一個士兵的死亡,產生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在臺灣近年來,這是一個一般的民眾變成市民的重要事件。因此我相信市民人數的擴大是有可能性的,祇是有時候我們需要去等待或是製造這樣的可能性。以上是我的簡單回答,請多指教,謝謝。

接下來是針對野口先生的問題。研究者進入大學之後會遇到很多非常沉重的工作負擔。我不曉得這是不是野口先生問這個問題的意思,但是目前我想到臺灣的困境,就是這個樣子。

我認為在臺灣大學現場的研究者必須團結起來，去開拓更多向市民對話的空間，去分辨大學裡面的工作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然後一起來改變整個大學現場的工作的結構。這樣就可以發揮比較多的社會影響力。以上是我的簡單回答，請多指教。

第三個是針對丁韋尼阿明同學的回答。我的回答其實很簡單，就是我贊成丁同學的想法。不過我想之所以要強調不同的這一點，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如果太過於強調相同，將會產生新的霸權。所以我想一切還是要從強調不同這一點來觸發。而後續的交流就需要持續的對話。以上是我的簡單回答，謝謝。

第四個是針對楊維公同學的回答。還是一樣的狀況。這在臺灣也是非常嚴重的，就是私立大學倒閉的問題。而國立大學的文科縮減跟私立大學倒閉的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就是來自於經費跟學生工作機會的問題。所以我想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人們都應該要加強和社會的對話，這樣也許能獲得更多的社會影響力，也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資金贊助。並且或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這兩個問題。可能目前還是很天真的想法，總之請大家多多指教。

接下來是針對矢內同學的回應。其實沒有特別的想法，我祇是想說我很贊成。

接下來是針對江俊億同學的回應。關於媒體如何與不切實際的研究者結合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必須要先認識到媒體是在不停地在變化當中的。傳統的媒體是單方面的發送訊息，單方面的接受。自從 Blog 這樣的技術出現以後，就改變了這種情況。而現在更是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網路，讓自己本身就成為媒體的時代。研究者在當今的社會中面臨到傳統媒體與自己是對立的狀況。但是祇要使用新的技術，我們自己本身就是媒體。我想這是唯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也是增加研究者和社會對話的方式。以上是我的全部回答，花費了很多時間，請多指教，謝謝！

王楠：

时间有限，所以之前陈先生回答过的我比较赞同，就不重复了。我只回答一下前面几个问题。首先是对坂梨先生的提问。坂梨先生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偏狭的立场。我想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不论哪个角度，都有一定的偏向性。但其实历史研究，一定不是客观的，无论你做的是什么研究，你都是受到某一种视角的影响，有可能是你知道的，也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杨金华同学在她的文章里面已经提到，区分一下市民社会与普通大众，在中国其实能称得上是市民的是绝少数的，或者说市民这个东西在中国还是不存在的。许燕华老师说到，听说中国人的青年对政治比较有热情。但这种热情是虚伪的。这种热情来自毛时代的遗产，但事实是它只是在顺应国家的大方向。如果让他们来反对政府的话，这方面他们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关于野口先生的提问，我现在是学生，但是比较讽刺的是我最近在找工作，我找工作的方向是可能会去马克思主义学院。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很多高校都在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很多职位的空缺，也就是我将来能教的主课将是政府规定的近代史纲要，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史学。但是我想我可能会告诉学生哪些需要考试背下来就可以，另外还会向他们介绍我自己真正的研究。时间有限，我的回答就是这样。

（以下爲論壇結束後補做的回答。）

“过量的历史”一词，出自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也就是《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在这本书里，尼采提出了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观点：将当时德国推崇的“历史主义”视为时代的缺陷，认为德国人患上了一种恶性的历史狂热病。尼采当然不否认，每个人、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的了解，但他认为，历史终究是人类的仆人，历史的意义是服务于人类的现在与将来，而不是“让死者埋葬生者”。根据人类对历史的需要，尼采区分了三种历史：纪念的历史、怀古的历史、批判的历史。纪念的历史的“过量”表现在对历史榜样的无度追索，用错误的历史类比误导人；怀古的历史的“过量”显示为对过去的极端推崇，致力于对一切旧事物的保存，反对创造新生命；批判的历史也会有破坏性，当它过头时，会导致人们认为没有什么高尚的，从而走向对生命的厌恶。因为这些“过量”，尼采甚至觉得某种程度上，当时的人们仍处在中世纪，而历史变成了一种伪装的神学。

尼采精彩的讽刺，对我来说很具有“诱惑力”，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也患有类似的历史狂热症。不过“过量”一词虽然含有“量”字，但何为过量，何为适宜的标准其实是很难确定的，这并非一个可测量的问题。如果借用尼采的分析，简单点讲，“过量”即历史与生活的自然关系被摧毁了，缺乏非历史的、超历史的立场，具体我是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判断历史是否过量了。

本次讨论的中心之一是东亚各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来看，“历史”的确近似于伪神学了，形成了一种不论谈什么都完全绕不开历史的姿态，始终背负着战争留下的重负。去年5月，人民网总结习近平近年对中日关系的五次表态，每一次表态都特别强调了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仅仅围绕第二次中日战争展开的所谓历史问题是否有必要成为中日关系讨论的核心呢？人们可能“忘了”，1980年代和90年代处的中国媒体上，都是两国人民交好的欢声笑语，那时候没什么人纠缠于过去。而在当下，八九十年代的“过去”又被扫到垃圾桶内了——这就是一个滥用历史的典型例子。抗日剧的激增同样是滥用，大陆有可以审查一切的广电总局，这么多剧情离奇的神剧能够上映，不正是因为官方对那段历史的病态执着吗？讽刺的是，人们以强国心态纪念过去，寻找抗战榜样，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堆英雄，反而搅乱了很多人的认知：英雄们如此厉害，抗战为何迟迟不胜？不过“没关系”，过量的纪念的历史本来就是只求结果相同——过程不论，抗战终归是胜利了，纪念一下与中共相关的抗战英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去年8月，习近平评价说，抗战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看到了么，官方认为抗战乃至当下国家发展的意义，在于一只活了几千年的老凤凰的完全重生。再想想，“中国梦”的第一次提出，就是在国家博物馆——我们对于未来的认识如此匮乏，非要从被狭隘化、被神化的过去寻找。再看流行的反腐问题，中纪委常请人文学者来谈反腐，二月河说得最有意思，他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仿佛我们还活在帝国时代。似乎，大陆官方正在推动一种“言必论史”的趋势，那种陈旧的气息不能不让我想起尼采关于“过量”的各种精妙的讽刺。

福谷彬：

谢谢给予我们这么多意见。由于时间有限，这里我只针对江同学直接对我的提问进行回答。

我所理解的江同学的问题是最现实的媒体该怎样与远离现实的研究者结合。首先，针对问题中研究者远离现实这样一个前提，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虽然研究者无法直接对一般社会进行发言或者缺欠那种热情，但研究本身依旧是关注到现实的。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是研究者应该怎么与现实的媒体相关联。如陈先生所说，媒体自身也在转变。媒体曾只是用来传播的单一发信工具，但近来观众的意向也逐渐被吸收进来，并且很多人通过 Blog 等等进行自我传播信息。所以，我认为作为研究者，在不被媒体利用的同时，自身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向公众传播自身研究成果的态度很重要。以上是我的简单的回答，谢谢。

中山大将：

（由於論壇當天時間有限，以下為日後所寫。）

瀨戶徐同學對我提出了以下問題，即被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個人以及群體批判時，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能收到這樣的提問我感到很高興。正如瀨戶徐同學在第一天的綜合討論時說到，她在研究過程中一直注意既不成為研究對象，即“當事人”的“廣告代理”，也同時注意不要對“當事人”進行暴力性的論述，對此我也有同感。研究者與調查現場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領域，在歷史學的研究中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對此，我曾有一段親身經歷。我曾收到我研究對象所組成的一個團體的邀請，草擬了一份文稿。但這份文稿中的部分記述與該團體中一部分人的歷史認識不符，在編輯階段曾作為問題被提出。簡單講，我的記述在他們看來完全否定了該團體的正當性、作為受害者的處境以及自己對過去的記憶和認同。但是，我在堅信自己的歷史認識并非在否定他們的想法和感情的同時，我也能理解他們為何會做出那樣的判斷。其實在就究竟發生了什麼上而言，我和他們的認識並無太大區別。然而，對於這些發生的事應該進行如何解釋上，我和他們的看法之間存在異同。因此，在我看來，研究者理解當事人的心情和研究者需要與當事人擁有同樣的歷史認識和世界觀完全應該是兩碼事。更進一步說，我書寫了怎樣的內容與當事人是如何理解的也應區分看待。我並不認為祇有與當事人擁有同樣歷史認識的才是真正的歷史研究，我也不認為受到當事人批判的歷史研究是錯誤的歷史認識，應該加以改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當事人之間也不一定擁有同樣的歷史觀。我們不應將當事人奉為審判者，這樣做對無法成為一名合格審判者的當事人來說也會是一種負擔，不如說審判的工作應該留給研究者，這時才是研究者應該首當其衝登場的地方。我覺得這不僅是對於歷史學，在社會學等學科領域也是同樣的道理。最終，該團體內部達成一致，決定尊重外部人士不一樣的觀點，我的文稿被原封不動登載在他們的出版物上。如果當時這個團體堅持自己的歷史觀，我的文稿或許不會被登載。我覺得他們對話態度值得尊敬。

有關朴裕河教授的問題，我目前很想知道的是從出版到控訴的過程朴教授與原告之間到底有多少溝通？在我平時的論文執筆過程中，我會盡可能地將出版的論文寄給協助我的諸位當事人，有時出於必要還會將草稿寄送諸位。在收到諸位協助者的來電和來信時，我真的非常緊張。不僅是研究對象的當事人，當其他人對我的研究進行批判時，我希望他們能給予我電話、信件或者面談等對話的機會。當然，若比較有話語權的人，也可以通過大小各種媒體進行批判。二戰後日本著名思想家之一的吉本隆明先生，據說他從不謝絕前來到訪的讀者，與

每個人進行討論。此外，在日本學術書籍中都會夾有“讀者卡”，讀者可以通過出版社將自己的意見告訴作者。

有關朴裕河教授的問題，在此我還有一點相關的問題想論述。我曾聽一位老師說過，“當我讀完她的書，我就認定她是我的敵人”。說實話，當聽到這句話時我感到無比悲傷。同是“愛知”之人，為何要有敵我之分？對此，我認為福谷同學所介紹的宋代士大夫間的學術交流很讓人啟發。

另外，坂梨老師指出日本社會正在逐漸喪失能夠作為“市民”的餘裕，我覺得這點與野口老師指出的有關聯。我相信作為教師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能為市民社會的不斷成熟做出貢獻。然而，首先我們應該捨棄精英和特權意識。我曾聽一位歷史學教授說過“選舉也不能改變社會，所以我不要去選舉”，可他年輕時卻一直關注學生運動。我們不應忘記研究者也不過祇是被平等賦予了權利的一介市民而已。